

# 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

钟志清

在我国,学术界一向推重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所产生的绵长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对现代希伯来文学尚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与重视,尚未有高校开设现代希伯来文学这门课。本文试图从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界定、产生渊源与发展脉络等方面入手,勾勒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总体特征;并从文学史、小说、诗歌翻译以及研究概况等方面探讨它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情况。

## 一、希伯来文学、犹太文学、以色列文学的界定

要想更好地把握希伯来文学,首先要确定希伯来文学、犹太文学、以色列文学几个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希伯来文学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概念,顾名思义,指各个历史时期用希伯来语言创作的文学。它不仅具有一般文学所应该具备的艺术和美学特征,植根于民族传统和历史;而且具有不可比拟的独到之处。众所周知,《希伯来语圣经》不仅是宗教经典,是对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文学总集。它记录着古代希伯来民族起源、谱系与远古历史经历的传说,人神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以色列称谓的由来、律法、信仰准则、习俗规范等,而且描写世俗情感,抒发心灵之音,成为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后圣经时代的希伯来文学散见于启示书、《塔木德》、《密西拿》等著述中,既闪烁着智慧之光,又象征性地表现出时代精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记载了犹太人漂泊异乡、颠沛流离的悲剧命运。现代希伯来文学更多地表现了犹太人在传统与现代、本体文明与外在同化相互纠葛之间的内在心灵冲突。

希伯来文学是犹太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但不能代表着全部犹太文学。犹太人是个以民族为核心的观念。犹太文学,最简单也是最令人能够接受的定义就是“犹太人所创作的文学”。<sup>①</sup>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界定犹太文学这一概念时,存在着带有普遍性的困惑。这一论争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犹太身份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所居住国家的语言,以标示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这样一来,便引起学者的思考和发问,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把犹太文学限定在用某种特定语言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拉迪诺语所创作的文学?抑或是皈依犹太教的人所创作的文学?<sup>②</sup>

以色列是个国别概念。以色列文学从时间跨度上说,的确还很年轻,指的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文学。由于以色列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文学构成也表现出强烈的多元色彩。换句话说,在以色列国内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文学成果均应属于当代以色列文学的范畴。但是,也由于以色列是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占国家人口约80%的犹太人无疑操纵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话语。希伯来语不仅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而且是以色列缔造者在建国前后塑造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手段,绝大多数犹太作家当然要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因此,当代希伯来语文学显然是以色列文学为主体,代表着以色列文学的成就与水准。

具体到个体作家,同样也难以界定其具体的归属范畴。有些犹太作家,并不单纯用希伯来语创作,同时还用意第绪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或其他语言进行创作。还有,许多犹太作家在欧洲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色列建国之前移居巴勒斯坦,究竟是将其称为欧洲作家、巴勒斯坦作家还是以色列作家?在这种背景下,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做法是,讨论希伯来文学以语言为评判标准;讨论犹太文学则是以民族概念为标准;讨论以色列文学则是以国别概念为标准。

## 二、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概略

现代希伯来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由于犹太人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流亡,希伯来语逐渐失去了作为日常交际语言的功能,只用于宗教圣殿与祈祷等神圣活动中。到18世纪中后期,欧洲的犹太知识分子“马斯基里姆”由于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响应德国思想家门德尔松及其门生的倡导,首先在德国

<sup>①</sup> Hana Wirth-Nesher. “Defining the Indefinable: 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 In *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 ed. Hana Wirth-Nesher. Philadelphia, Jerusalem: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4. p. 3.

<sup>②</sup> 同上,第3—12页。

发起了犹太启蒙运动，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哈斯卡拉”，亦被称为希伯来启蒙运动。

多少个世纪以来，囚禁在“隔都”内部的犹太孩子们接受清一色的传统希伯来书面文化教育，用意第绪语进行口头交流。而在倡导启蒙时期，则首先需要进行自我启蒙，让犹太学生在研习宗教文化之际，接受一些世俗文化与科学教育，甚至学一些欧洲语言，以便使犹太人走出“隔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教育的集中在启蒙思想上：用知识战胜愚昧，用理性战胜迷信，用现代文明之光驱走中世纪的黑暗。<sup>①</sup>但是，究竟用何种语言向犹太人进行启蒙教育，确实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用希伯来文学史家克劳斯纳的话说：用希伯来语在犹太人中兴起一场新的运动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sup>②</sup>因为对启蒙运动倡导者来说，毕竟希伯来语是他们唯一可以支配的文字或者说文学语言。而“马斯基里姆”所要实现的自我启蒙愿望，就要求把大量的哲学、科学、地理、历史等书籍翻译成希伯来文。在这种背景下，启蒙倡导者呼吁用先知语言来振兴文化。一种表达新型犹太生活的新的文学也因此应运而生。

一般说来，学术界把 18 世纪 80 年代初视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个起点。1782 年，在德国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的纳弗特利·赫茨·威塞利为奥地利犹太人撰写现代犹太教育理论，后被意大利犹太社区采纳。威塞利是门德尔松的好友，积极为门德尔松创办的杂志撰写文章，成为那代人当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此后，希伯来文学在奥地利、加利西亚、意大利、俄国等地复兴并发展。<sup>③</sup>

大体上看，从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一百多年间，可以称为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启蒙时期。这时期的希伯来语文学相继表现出支持启蒙主张，向往犹太世俗生活，并在传统与现实世界之间、在固守民族信仰和同化之间徘徊不定的复杂心态。1881 年发生在俄国的集体屠犹事件、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主义声浪的高涨，再到后来的大屠杀，这一切在犹太社区内部引起了种种反响，犹太知识分子在启蒙时期所抱的同化幻想逐渐破灭，有些对希伯来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 19 世纪末期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希伯来文学创作中心也逐渐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从此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衍生，有了固定的栖居地。但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主要是一些移民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 (Shai Agnon)，他们笔下的希伯来语主要是一种规范的文学语言。

① David Patterson. *A Phoenix in Fetters: Studies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ebrew Fic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 4.

② 约瑟夫·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第 3 页。

③ 参见 Simon Halkin.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Birth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rends and Values*. p. 19. 又见：克劳斯纳：《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第 3—37 页。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活跃在文坛上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作家主要有三代。第一代作家通常被称为“本土作家”，他们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出生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多在 30、40 年代登上文坛。其作品背景多置于巴勒斯坦地区，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本土以色列人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本土作家”时代，希伯来语成为真正的自然的表达工具，他们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时下俚语和日常用语，形成典型的以色列话语特征。但当时的以色列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还只是一种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了 60、70 年代，以色列人在建国前所表现出的那种高涨的英雄主义情绪已经减退。对于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开明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1956 年的“西奈战争”不同于 1948 年的“独立战争”。如果说在“独立战争”中，以色列人是为争取生存权利进行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的话，那么“西奈战争”则是人为的选择，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曾经无情地杀害手无寸铁的阿拉伯村民，震惊整个犹太社区。战争所导致的心理矛盾为小说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带来了变化。出现了第二代以色列作家，即学术界所命名的“新浪潮”作家。<sup>①</sup>这批作家在表现以色列人生存境况的同时，偏重探索人的心灵世界与内在生活空间，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手法，把以色列文学推向高峰，出现了世界级的大作家。第三代以色列作家即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现在文坛的年青一代作家，该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倾向。

### 三、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犹太现代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始于五四前后，茅盾、胡愈之等文学前辈曾经将肖洛姆·阿雷汉姆 (Sholem Aleichem) 的意第绪语作品翻译成中文；<sup>②</sup>1930 年代唐旭之先生从英文翻译了阿胥 (Sholom Asch) 用意第绪语写的《复仇神》。至于希伯来文学，20 年代的《小说月报》上曾经发表过赤城翻译的《现代的希伯来诗》，但此后数十年学者和翻译家几乎对于希伯来语文学再无涉猎，其原因来自语言、意识形态、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笔者无意在此篇论文中作详细探讨。<sup>③</sup>

台湾曾经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出版了一些以色列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当代以色列小说选》(王云五主编，徐进夫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年)、阿格农的

① Gershon Shaked. *Modern Hebrew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189.

② 参见姚以恩：《莫吐尔传奇》前言，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 年新版，第 1—2 页。又见徐新主编：《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前言，漓江出版社，1992 年，第 2 页。

③ 王向远曾经述及当代以色列文学译介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原因。见《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6—108 页。

《订婚记》、《伊锋和伊南古语》(王润华、朱碧云译,收于《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的《少女彩莉》(吕文玲译,台湾星光出版社,1987)。几乎与此同时,阿格农的短篇小说也开始在大陆出版,如《逾越节的求爱》(钱鸿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相对于同时期我们对俄苏文学、欧美文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文学的介绍,以色列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声音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堪称微乎其微。

1992年中以两国的建交打破了中国译介希伯来文学的岑寂局面。同年,便有三部希伯来文学方面的译作问世。即《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徐新主编,漓江出版社),《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傅浩译,中国社会出版社),以及克劳斯纳的《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按照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统计数字,<sup>①</sup>1986年到1996年共有12部希伯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但之后十年便有48部作品在中国问世。总共有60余部希伯来小说翻译成了中文,并且还有十几部正在出版过程中。

当代希伯来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当然多译自英文或者是其他文字,往往也听到学界对此抱有微词。其实,翻译过程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文化。<sup>②</sup>文化难度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他者”文化的把握程度,可以有助于你理解原文;另一方面则是母体文化素养,可使你能更好地传达出原作精神。优秀的译者不仅要有良好的语言功底,还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翻译经验。而希伯来文学的英文译者、法文译者乃至其他语言的译者多是具有双重母语,也就是说,他们或出生在英美,后移居以色列;或出生在以色列,而后多年在英美读书工作,相当一部分是颇有名气的大学者。如剑桥大学的德朗士(Nicholas de Langer)、原哥伦比亚大学的哈尔金(Hallil Halkin)等,他们对希伯来文的理解与英文表述无可挑剔。尽管翻译过程中会流失一些东西,但译文绝对忠实可靠,值得信赖。相形之下,出身于另一种母体文化的中国学者要想在希伯来文水平上、文学与文化功底上、翻译体验上达到他们的水准,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倘若英文译者有很好的文学基本功,熟悉翻译技巧,能够发现并适当处理好文化背景中的陷阱(切忌望文生义),是可以翻译出上乘的希伯来文学作品的。当然,这样的译者,如果再有机会掌握希伯来语,委实如虎添翼。从另一方面看,学习希

<sup>①</sup> 该信息来自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Nilli Cohen)女士在北京2006年8月28日“以色列文学之夜”上的讲座。感谢她在会后所提供的书面材料。

<sup>②</sup> 此话乃笔者接受博士导师之一浦安迪教授(Prof. Andrew H. Plaks)面命时所获。浦安迪乃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兼希伯来大学)资深教授,通晓十几门语言,并将《大学》、《中庸》翻译成希伯来文和英文。

伯来语的译者相对说来具有熟悉希伯来文化背景的优势——尽管要真正进入那个背景需要的是映雪之功,但是希伯来语只是一种工具,而做一个优秀的译者需要多方面的素养和穷其毕生的努力。

### 1. 希伯来文学史的翻译

迄今,两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翻译成了中文。第一部即前文提到的《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根据阿拉伯文译出。该书作者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1874—1958)是著名的希伯来文学史家,犹太历史学家,生于立陶宛,成长于敖德萨,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后在东欧接替阿哈德·哈阿姆编辑重要的希伯来文学杂志。1919年移居巴勒斯坦,1922年发表了著名的《拿撒勒的耶稣》,希伯来大学成立后,受聘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后为犹太历史系主任,1949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提出了现代希伯来文学兴起的概念,简洁而系统地考察了自18世纪中后期犹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希伯来文学发展历程,包括各种文学流派以及诸多文化、社会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对我国的希伯来文学学者无疑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部便是当代著名希伯来文学史家谢克德(Gershon Shaked)教授的英文版《现代希伯来小说》(钟志清译,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现代希伯来小说》是谢克德在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五卷本希伯来版《现代希伯来小说》(*Hasiporet Ha'ivrit 1880 – 1980, Vol. 1 – 5, Jerusalem: Keter/Tel Aviv: Hakibbutz Hameuchad, 1977 – 1999*)的基础上缩写并翻译而成。全书共12章,追溯了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希伯来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既论述了希伯来小说传统的内部发展规律,又讨论了最著名作家及其最优秀的作品,许多章节还对个体作家作了扼要概述。

英文版《现代希伯来小说》在编者前言中指出,谢克德接受了文学史家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既必须呈现具有独创性和审美完整性的作品,又要展示产生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创造出我们所说的文学史。通过对特定作品所作的详细分析与阐释,谢克德从风格和主题着手捕捉到令文本产生魅力的魔法;又通过作家生平概述、历史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分析,阐明了占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在希伯来文学发展进程中进行作品创作的条件。用这种方式,谢克德探究并阐明了希伯来小说审美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关系。他审视了终极交互文本:文学与人生的相互作用。同时,谢克德还做了一项通常不需要文学史家、至

少不要求那些撰写伟大西方传统的文学史家所做的工作：他传达出现代希伯来小说经典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它有资格进入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舞台。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些方法，学习其他文学传统的人可以借助这些方法开始考虑希伯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例子，进而阐发了希伯来文学传统的启迪力量。

## 2. 小说翻译

小说翻译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翻译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成果斐然。大体说来，希伯来文学在最初的译介过程中，比较注重经典作家。前文所提到的台湾版和大陆版的两个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遴选的均为 20 世纪希伯来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家，如阿格农、伊兹哈尔（S. Yizhar）、哈扎兹（Haim Hazaz）、塔木兹（Benjamin Tammuz）、沙米尔（Moshe Shamir）、阿米亥（Yehuda Amichai）等，大陆版比台湾版晚出近二十年，进而收入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登上文坛的一些世界级大作家，如奥兹（Amos Oz）和阿佩费尔德等。之后，《当代外国文学》在 1991 年第 2 期、《世界文学》在 1994 年第 6 期、《国外文学》1994 年的以色列文学专辑基本上也是以经典作家为选择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约书亚（A. B. Yehoshua）的中篇小说《三天和一个孩子》（陈贻绎译，1994），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的《婚礼华盖》（徐新、刘洪一等译，1995），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沙伯泰（Yaakov Shabtai）的《过去的延续》（麦丽娟、谢勇译，1995）。

继之，一些出版社把目光投向出版现当代希伯来语文学丛书上。译林出版社独自购买了以色列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摩司·奥兹的五部长篇小说的版权，自 1998 年夏陆续推出《何去何从》（姚永彩译，1998）、《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1998）、《了解女人》（傅浩、柯彦玢译，1999）、《沙海无澜》（姚永强、郭洪涛译，1999）、《费玛》（范红升、尉颖颖、徐惟礼译，2000）。将一个以色列作家的五部作品一并推出，这在当时，堪称我国希伯来文学翻译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了。《我的米海尔》引起评论界的众多目光，池莉、徐坤等女作家对奥兹作品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池莉经常提及奥兹简约优美的语言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丁帆等当代文学批评家也撰写文章对奥兹所代表的另一种文化现象表示深深的理解。《我的米海尔》在 1999 年获得中国第四届外国文学图书奖，成为第一部在中国获奖的以色列文学作品。之后，《我的米海尔》与《了解女人》得以再次印刷，并在几年后由台湾皇冠出版公司再版。另一位由河北少儿出版社独家介绍的以色列著名作家是获得安徒生奖的儿童文学作家奥莱夫（Uri Orlev），2000 年即有三部中译本问世，包括《鸟雀街上的孤岛》（李文俊译），另两部《巴勒斯坦王后莉迪娅》、《从另一边来的人》均由杨恒达先生主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与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合作在 1998 年出版了林骧华主编的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其中包括布伦纳（Yosef Haim Brenner）的《生死两茫茫》（罗汉、孟俭译）、伏格尔（David Vogel）的《婚姻生活》（杨东霞、杨海红译）、伯斯坦（Yossel Birstein）的《朦胧面纱》（廖慧祥、萧耀珍译）、阿尔莫格（Ruth Almog）的《小外套》（于青译）。百花洲出版社和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合作出版了高秋福先生主编的以色列文学丛书，包括凯纳兹（Yehoshua Kanaz）的《节日之后》（钟志清译）、伯斯坦的《收藏家》（隋丽君译）、康尼尤克（Yoram Kaniuk）的《墓园之花》（沈志红、高穗译）、《阿多尼斯》（戴惠坤、肖黛译）。这套丛书也得以再版，并且在 2001 年获得中国第五届外国文学图书奖。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于 1998 年问世，包括塔木兹的《米托诺之恋》（郑雅兰译）、卡斯特尔-布鲁姆（Orly Castel-Bloom）的《米娜·丽萨》（杨玉功译）和阿尔莫格的《雨中之死》（朱美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目前已经有四部作品上市，奥兹的《黑匣子》（钟志清译，2004）、阿格农《一个简单的故事》（徐崇亮译，2004）、沙莱夫（Meir Shalev）《蓝山》（于海江、张颖译，2005）和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证之于：爱》（张冲、张琼译，2005）。这几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希伯来文学中国的译介已经“开始走向规模化和系统化”。

一些杂志上登载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专辑也体现出一种系统性，比如《世界文学》杂志 1999 年第 6 期的“以色列中青年文学专辑”和 2003 年第 6 期的“大屠杀文学专辑”，比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示出一种特定的文学想象和作家群，并配有相应的评论文章或者介绍性的前言，体现出清晰的编辑思想。此外，河南人民出版社《以色列的瑰宝——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基布兹”短篇小说选》（何大明译，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焦灼的土地：现代以色列小说选》（高秋福主编，1998）、中国妇女出版社《地中海的玫瑰》（2004）等也体现出编辑导引读者的意图。

与此同时，出版社为了能够在中国打开销售市场，开始引进以色列畅销小说作家。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以色列女作家茨鲁亚·沙莱夫的畅销作品《爱情生活》（周晓萍译，2006），首版印刷 8 000 册，但是在以色列和欧美畅销的作品是否能得到中国读者青睐，还需要时间检验。

## 3. 诗歌翻译

与小说创作相比，现代希伯来诗歌的译介势头似乎有些薄弱。但是确也不乏出色的译作。前文提到傅浩翻译的《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1991)从阿米亥的7部诗集中遴选出180首诗，并配有一篇颇见译者诗歌功力的序言，对当时中国读者认知阿米亥这位世界级的希伯来语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约十年后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耶路撒冷之歌》的基础上，出版两卷本的《耶胡达·阿米亥诗选》(2002)，为希伯来语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增添了宝贵的一笔。

我国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诗人选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心声》(高秋福主编并翻译，1998)，其中遴选了20世纪四十三位富有代表性的希伯来语诗人的近二百余首诗，既包括“现代希伯来诗歌的伟大代表”比阿里克(Haim Nahman Bialik)、20世纪优秀诗人阿米亥，又包括了80、90年代著名的女性诗人，使中国读者对近百年来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发展流程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与了解。诗言志，“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百年心声》让人窥见不同历史时期犹太民族的心路历程与价值观念：带有个体与民族教育色彩的呐喊，对自然与爱情的渴求，重建家园的热望，双重家园的痛苦，信仰、民族、历史与个体存在、个人幸福之间的矛盾，等等，对从事以色列社会与犹太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很有借鉴意义。

此外，《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等杂志出版的以色列文学专辑，也根据不同专辑的内容需要，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创作。

#### 4. 研究概况

我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委实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希伯来文学学者最初所走的路与英美文学、俄苏文学和东方其他各国文学研究者最初所走的道路有着近似之处，同样肩负着启蒙读者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希伯来文学论文有一定程度的介绍与评述色彩，对现代希伯来文学、当代以色列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向进行介绍、述评与分析。比如说南京大学徐新教授的《现代希伯来文学概述》(《当代外国文学》1992年第4期)、《以色列文学四十年》(《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和笔者写的《80、90年代以色列文学刍议》(《世界文学》1999年第6期)、译林版五卷本奥兹文集序言《阿摩司·奥兹及其作品》，以及许多翻译作品的序言等均可以归于此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面世的此类文章中，无疑也闪烁着中国读者在对希伯来文学作品进行文本解读时所体现出的独特视角与理解方式。如徐新教授的《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丰碑——阿格农论》(漓江出版社，1995年)。

由于多种机遇与巧合，笔者2006年问世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成为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考察当代希伯来文学的著述。全书共分八章，前四章按时间顺序探讨当代以色列文学发展史和作家、作品，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过去五十余年

的以色列文学有一个总体把握。后四章属于专题研究，考察国家建设语境下的大屠杀文学、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形象、文学与宗教、文学如何承担塑造民族身份的使命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考察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的同时，也注意到以色列某些作家采用双语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述及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和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拉伯作家。

笔者在前言中写道，《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能够在希伯来作家作品和文学史料方面提供一些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从文学现象、社会话语和文化传承等角度提出一些国内学术界尚未关注的见解和思想，通过力求严谨的论证在展现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等方面作一些先行性工作。这样，它也许能够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行与后辈，以及对当代以色列文学与社会感兴趣的学友有一些借鉴与启发。

以上文字对数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扼要梳理与评析。由于笔者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并参与其中一些工作，协助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编辑了《希伯来文学中译本》(中英合本，2004)，大概不会挂一漏万。但是，限于篇幅，不可能把所有译本一一列举。因此，特请译者和出版单位见谅，也请大家提出补充与修正意见。